

山东老年大学统编教材

传记·回忆录写作导引

王兆彤 编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I055

16

3

1577/16

传记、回忆录写作导引

王 兆 彤

山东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济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传记、回忆录写作导引

王 兆 彤

*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8.75印张 192千字

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490

ISBN 7—5329—0051—7

I·48

统一书号 10331·315 定价1.80元

编写说明

山东老年大学，是我国最早专为老年人创建的学校。近四年来，聘请了本省各高等院校教学经验丰富的教授、讲师为学校讲课并编写了各科教材。经过教学实践现统一进行了修订，基本适合老年人保健和丰富知识的需要，并具有为老年人适应的简易性、知识性、实践性、趣味性等特点。

为满足更多老年学校和广大老年人的需要，特编写此套教材，自今年始将有：《老年卫生保健》、《实用花卉学》、《古代文学精华录》、《文艺十二讲》、《文章写作指要》、《传记、回忆录写作导引》等十余种，陆续出版发行。

山东老年大学教材编审委员会

1984年4月

目 录

一、传记文体的性质及分类·····	1
二、我国传记发展简史·····	19
三、我国古代自叙体传记概述·····	45
四、传记写作前的准备·····	53
五、传记的写作要求·····	64
六、传记写人的艺术·····	76
七、自传写作示例·····	99
八、他传写作示例·····	155
九、回忆录文体要略·····	199
十、他（她）们这样写回忆录·····	218
十一、回忆录写作示例·····	231

一、传记文体的性质及分类

(一) 传记文体的性质

传记，顾名思义，就是给人物立传；详细一点说，就是记载、描写、评述人物生平事迹的文章，属记叙文的范畴。

目前，传记作品出版很多，非常受读者欢迎，好多传记作品都成为畅销书，在社会上发生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对于传记这种文体的性质，在学术界存在着很大的分歧，至今尚没有统一的认识。理论上的含糊不清，势必会引起实践上的混乱。由于对传记这种文体性质的理解不同，产生了不少不是传记的“传记作品”。如有的传记作品，写的是历史上某一人物，但作品中所写人物的许多事迹，却纯属作者的虚构，在读者中造成混乱。这种现象必须改变。

关于传记的文体性质，有以下两种对立的认识：

一种认识是，传记属历史范畴，是历史著作中的一种十分重要的文体。它是历史事实的客观记录，不允许有任何的烘托和渲染，也就是说，不能运用任何文学手法，否则，传记就丧失了它的史学价值。另一种认识是，传记是文学中的一个独立部门，不只是史学的一个支流。它要求作者要生动地刻画出传主

的形象，使读者受到感染，读者在传记中看不到活生生的人，这就不是优秀的传记。

这两种认识都是片面的，前者忽视了传记的文学性，后者忽视了传记的真实性。我们应当把这两种认识结合起来。传记既是历史又是文学，是历史和文学的完美结合。也就是说，传记必须忠于史实，不允许有任何的虚构；同时又必须运用一定的文学手法，把历史上的人物再现出来，传主的形象要生动感人，性格特征要鲜明突出。只有这样，才可称得上是优秀的传记作品。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在《史记》中，就为我们树立了写作这类传记的典范。

现在人们公认，人物年谱不是传记。“年谱”详细汇集了人物的生平事迹，有些“年谱”还不厌其烦对人物的活动、著述等进行了考证，可谓忠于史实。年谱之所以不是传记，就是因为它不着重刻画人物，只是罗列了人物的某些事实。同样，某些人物介绍，也不能被认为是人物传记，如下面这段文字：

布哈林（1888——1938），苏联布哈林——李可夫反党联盟首领之一。1906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7年任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十月革命后，历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真理报》主编等职。1928——1929年，与李可夫等结成反党联盟，鼓吹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等谬论，反对全面实行农业集体化，1929年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1937年被清洗出党，次年被处死。

这是1980年版《辞海》中的一个条目。在这个条目中对布哈林的评价是否全面正确我们且不说，它只是罗列了布哈林的

主要经历，从中看不到布哈林这个“人”，所以不能叫做传记。

此外，在许多出版物中，我们还常看到《×××小传》或《×××传略》之类的文字，如画家徐悲鸿的小传：

徐悲鸿，原名寿康，江苏宜兴人。小时家境贫穷，幼年从父亲徐达章学画。十四岁时，跟父亲外出卖字画谋生。十七岁时，独自在上海卖画糊口，不久即潦倒而归。为维持生计，便在本县中学当美术教员。十九岁时，再次去上海谋生。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画了一匹马寄给了当时上海美术馆馆长高奇峰，竟意外地受到赞扬，予以出版。他靠这点稿费念了半年大学。

1917年，徐悲鸿靠私人的资助留学日本。数月后，资款用完，不得不回国。在北京结识了当时的大画家徐师曾等，获得了很好的学习机会。1919年至1927年，他被派往法国学油画，回国后，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

徐悲鸿是一位爱国主义画家，他曾在画中题诗，辛辣地讽刺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主义。并曾因拒绝为蒋介石画像而被迫流亡桂林。与此同时，他却以钦佩和同情的态度绘画了《愚公移山》、《醒狮》等，热情地歌颂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战争，鼓舞了人民的斗志。

解放后，他曾任中央艺术学院院长，美协主席和政协委员等职。

徐悲鸿融合了中西画法，自成一家。他的画表现领域很广，他画的山水、人物、风景、鸟兽，都取得了卓著的成就，尤其是人物和马的画卷，更为突出。

对待传统，他有自己的主张。他说：“古法之佳者守

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绘画之可采入者融之。”他以大量的创作体现了自己的主张。

徐悲鸿一生谦虚谨慎，在艺术上勇于探索，以积极进取的精神，为我国绘画宝库增添了珍贵的财富。

这篇徐悲鸿的小传虽比上面所引那段文字要详尽些，实际上仍属人物介绍；即使勉强可称之为“传”，也不是一篇好的传记作品。

不管认为传记是属于史学范畴的人，还是认为传记是属于文学范畴的人，还都一致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写历史人物的小说（如姚雪垠的《李自成》）以及有关人物的传说、故事等，都不能和人物传记混为一谈。因为这些作品虽然充分运用了文学手法，塑造出了生动感人的人物形象，但作者运用了虚构想象的手法，所写事实已不尽符合历史。为了主题的表达和情节发展的需要，作者甚至还可生造出某个人物来。这与传记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了。

为了使大家更为具体深刻地认识传记这种文体，下面我们来看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我们认为还是比较理想、典范的传记作品。

一个革命者的悲剧

——布哈林小传

• 王国荣 •

《共产主义ABC》等几百种社会科学著作的作者布哈林，是个在十月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起过重要

作用的悲剧性人物。可是，我们以前对他的了解，仅止于一本《联共（布）党史》和一部《列宁在一九一八》的电影。历史告诉我们，这不是他的真实面目。

两个美术爱好者的会见

1912年秋，沃里斯基列斯大森林铺满了金色的落叶，靠近大森林的波兰克拉科夫城里，列宁正日以继夜地工作，指导着俄国的革命运动。一天，一个身材瘦小、前额宽广、眼睛明亮的小伙子，背着一个大麻袋，找到了列宁的住处。小伙子到来前，列宁已听同志们介绍，他叫“奥尔洛夫”，学识渊博，擅长丹青。列宁也很爱好图画，知道小伙子从三百公里以外的维也纳专程来拜访他，感到十分高兴。

小伙子从大麻袋里取出了印刷精美的德国画家别克林等人的作品和自己创作的扎科帕涅山风景画。两位年龄相差十八岁的美术爱好者，好久好久地鉴赏着、评论着。话题从美术转到了革命。小伙子对革命理论见解独到、对形势估量思路敏捷，使列宁象欣赏他的美术作品那样惊叹起来。列宁邀请他为布尔什维克报刊撰稿，小伙子一口答应。

两人第一次会面不久，列宁就在《真理报》、《启蒙》等报刊上，看到了两人研究的课题发表在署名“布哈林”的文章中。原来，对美术有很高造诣的年轻人“奥尔洛夫”就是布哈林。

布哈林，1888年9月27日生于莫斯科一个教师的家庭。他是个早慧的孩子，不到五岁就能阅读书籍。少年时代，

他入迷于自然科学、文学艺术的书海中。1905年，他考上了莫斯科大学，但由于积极投身澎湃的革命洪流，他没去上学。第二年，十八岁的布哈林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年轻的布哈林在工人中宣传、鼓动，领导了莫斯科壁

年轻的布哈林在工人中宣传、鼓动，领导了莫斯科壁纸工厂的工人罢工，直到1907年才进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学习。但是，他把时间全部花在攻读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党的工作上，因而没有读完大学课程。从进大学的第三个年头开始，他三进沙皇政府的监狱。1911年，他从流放地逃了出来，亡命国外，听说敬爱的列宁离他才三百公里，恨不能插翅飞去见他！

舌战未停，却写来赤诚的信

布哈林十分敬重列宁，但他认为，列宁并非“石器时代”用“石斧砍出来”的“神像”。在他和列宁建立友谊的开始阶段，就充满激烈的争论。

1916年7月，列宁在给一位战友的信中透露：“我现在对布哈林也恼火得无法写信，请您立即写。”“正式向布哈林建议立即拿出一篇关于自决问题的辩论文章。”所谓“自决问题”的辩论，是指布哈林认为列宁提出的“民族自决权”的口号在帝国主义制度下“不能实现”，因而是“空想的”和“有害的”。不仅如此，布哈林还反对列宁提出的在俄国实行民主革命的号召，主张跨越民主革命阶段，把“无产阶级斗争的重心”立即转到“狭义的社会主义要求的领域”。对这些“左”的观点，列宁作了严厉的批评，指出布哈林超越民主革命的理论是从二十世纪初俄

国“经济主义”者那里偷运来的，“经济主义”者就主张，通过工人总罢工可以直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列宁决定，立即把同布哈林的理论斗争，放到党的议事日程上来，以确定正确的革命策略。

布哈林虽然没有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但在唇枪舌剑的高潮中，他却给列宁写了一封表达友情的信，信中说，争论归争论，作为学生，“我对您怀有十二分的敬意，把您看作我的革命导师而爱戴您”。

其实，列宁对布哈林是肝胆相照、赤诚相见的。他热情地赞誉布哈林“是个勤奋的经济学家”，在布尔什维克宣传工作中有“很大功劳”。列宁还为布哈林的《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一书写了序言，充分肯定他作出的帝国主义是“极其发达的资本主义的一定发展阶段”的科学论断，并在一年后所著《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吸取了布哈林的研究成果。当然，列宁也恳切地帮助布哈林寻找在一些理论上失足的根源，指出他轻信流言蜚语，在政治上极不坚定。同时，列宁还十分关切布哈林的生活，当他听说布哈林患病，十分焦急，不仅多次亲临探望，向他“致亲切的问候”，而且写信给党内许多同志，要他们表示关切，“衷心地希望他好好休养，很快地恢复健康”。这使布哈林深受感动。

惊心动魄的十月和1918年

1917年2月，俄国推翻沙皇制度。布哈林这时正在纽约帮助筹建美国共产党，获悉革命爆发，立即赶回俄国，担任莫斯科州的党的领导，为十月革命夺取莫斯科的战斗做

了巨大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十月革命后，列宁主持中央委员会讨论加强《真理报》的领导。与会的中央委员纷纷推举布哈林担任《真理报》主编。列宁反复权衡，表示反对，主张布哈林担任恢复经济的重任，说：“经济委员会至今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然而它是当前国家建设中一个重大因素，因此需要布哈林同志这样的行家。”导师的信任和委员们的期望鼓舞了布哈林，他决定兼任经济委员会与《真理报》的领导，以全付精力从事工作。

1918年初，布哈林等人 与列宁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产生了尖锐的分歧。布哈林把缔约说成向国际资产阶级“全线投降”，主张不惜牺牲苏维埃政权去进行对德国的“革命战争”，迫使列宁进行公开论战。列宁怒斥布哈林，是“以战争当儿戏，把革命断送给德国人”，“他实际上——虽不是他愿意的，——用这种幻想帮助了德国帝国主义者”。布哈林想不通，用辞去中央委员来保持他“革命完整性”的天真幻想。

然而，两件怵目惊心的事使他惊醒了。这年夏，反革命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利用联共（布）党内的分歧，发动叛乱，竟邀请布哈林参加他们的“新政府”，布哈林愤怒地拒绝他们，他的灵魂受到极大的污辱，他感到自己是“罪人”，他为列宁的安全担心。这天，他惊悉列宁格勒肃反委员会主席乌里茨基被刺杀，立即赶到列宁的住处。当他听说列宁晚上要去莫斯科巴斯曼区和南岸区演讲，更觉不安。他以孩子般的真诚极力劝说列宁取消演讲计划，列宁开始时一笑置之，后来不能不受感动，表示或许不去

了。谁知，列宁还是去参加了预定的群众大会，结果遭到暗杀，受了重伤。布哈林深受良心责备，承认自己“犯了很大的错误”，对自己“左”的思想进行了痛苦的反省和清算。

列宁说，如果我象布哈林那样善于画画……

1920年底，托洛茨基挑起了工会问题的争论。他主张“工会国家化”、军事化，用工团主义代替党的领导。针对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的错误观点，列宁强调了党的领导与说服教育的方法，提出了“工会是共产主义学校”的著名论断。由于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有集团、有纲领地发难，布哈林组织了一个“缓冲集团”，宣称列宁“从政治上”看问题与托洛茨基“从经济上”看问题同等重要，认为自己“正在把双方统一起来”，以图制止党的分裂。

列宁不怀疑布哈林的愿望是“十分真挚”的。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的最艰苦的年头，布哈林吸取了1918年的教训，与党保持了一致。他写出了被列宁誉为“辉煌的作品”的《过渡时期的经济》、影响了整整一代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ABC》（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合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等（该两书由许德珩先生于1928年前后翻译成中文），当战争结束，列宁为恢复崩溃的国民经济作出改革经济体制的重大决策时，布哈林最先支持了新经济政策。但是，在这次与托洛茨基的斗争中，列宁严厉指出，布哈林对这场原则争论的“缓冲”，“所犯的错误比托洛茨基所有的错误还要大一百倍”。列宁还幽默地说：“如果我象布哈林同志那样善于画讽刺画，那我就要

这样来画布哈林同志：一个人拿了一瓶煤油，正在把煤油倒在火上，这幅画的题目是：“缓冲煤油。”当然，这只是布哈林干折衷主义蠢事时的讽刺画。

1922年秋，重病中的列宁常把布哈林找去，躲避医生与夫人要他静心养伤的“监视”，挽着布哈林的手到花园长谈。列宁对布哈林说：“他们不让我谈政治，因为这会使我激动，但……我只有在能同象您这样的人谈论这些问题时才平静得下来。”列宁与他推心置腹地讨论党的方针政策与身后人事安排，说布哈林最能理解与表达自己的思想，如果来不及将苏联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系统地写成文字，希望布哈林能代笔。布哈林欣然接受了这个艰巨的使命。此后不久，列宁向党的代表大会发了作为遗嘱的信件，其中这样评价布哈林：“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贵重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应当被认为是全党所喜欢的人物，但是要把他的理论观点称作完全马克思主义的，那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在他的理论观点里面有一种烦琐哲学的东西。”不过，列宁补充说，这种评语“只是就现时来说的”，同时假定他“不去找机会来充实自己的知识并消除自己的片面性”。

列宁逝世后，布哈林遵照列宁的嘱托，回忆导师对他口述的思想，写了《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列宁》等小册子，要求全党认真研读列宁的著作，发掘丰富的理论宝藏。同时，布哈林积极地阐述和捍卫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他还担任了共产国际主要负责人的职务，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理论队”的神秘使命

同列宁一起工作是幸运的。布哈林同列宁的争论在党内生活中是完全允许的，那时，《真理报》开辟过一个讨论版，人人都可以争辩，探求各种可能的道路，进行争论又重归于好、并一起前进。他被列宁称为“党的合法的宠儿”，而他对列宁的“感激之情”也是“超过任何别的人的”，然而，到1928年，这种正常的民主空气已被一种高压政治所代替。

这年夏，“红色教授学院”的党总支所有委员及一些教员突然失踪了，他们的家属吵吵嚷嚷地向学院要人，学院里纷纷扬扬地传开了有关他们的谣言：有说他们被派到“中国朱德的司令部里工作去了”，有说他们“到西方搞工人运动去了”，也有说他们“被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逮捕了”……但在一个半月后，他们却带着一个绝密的使命回来了。中央某负责人决定建立一支“理论队”，分析、批判布哈林全部文草、讲话和书籍，以证明这位党内主要理论家“在理论上一窍不通，在政治上是败类”。

接着，“共产主义科学院”举行了“理论战线第一次积极分子大会”。当报告人在开场白中公开攻击布哈林是妄图取代党中央的“可怜的理论家”时，积极分子们惊呆了。这时，布哈林走进了会场，以“共产主义科学院”主席团委员的身份坐上了主席台，这使报告人的题为《布哈林学派的错误》的报告无法进行下去。幸亏工作人员告诉布哈林：斯大林来电，才摆脱了僵局。斯大林告诉布哈林，中央认为他贸然出席理论讨论会是不合宜的，中央不

能禁止学术机构进行学术讨论。然而，凡敢于同“理论队”的这个报告进行商榷和争辩的人，却很快被开除出党和投入监狱。

“布哈林学派的错误”何在呢？原来，1928年6月，布哈林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指出中央的“加速工业化”与“全盘集体化”的许多措施不符合列宁的路线，“使党从思想上迷失了方向”。斯大林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把它看作两条不同的工业化道路的根本标志之一。发展重工业需要大量资金，斯大林主张农民向工业化“贡税”。由于轻工业品奇缺、农产品收购价格很低，农民不肯出卖粮食，于是，斯大林要求全国农民都加入集体农庄。布哈林反对这项计划，认为粮食收购的困难是另一种“危机”——“比例失调”引起的“商品荒”造成的，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应给农民以看得见的实际利益，实行商品生产和重工业设备的平衡发展，集体道路和个体经济的平衡发展。布哈林不同意斯大林这种说法：社会主义越发展，它所遇到的反抗越强烈。他认为阶级斗争可以平和地渐渐地进行，并主要通过社会主义因素与私有因素的经济竞赛进行，使私有因素“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布哈林还警告：权力集中导致了官僚主义，党的领导有可能蜕变为用电报机、书记处和警察组成的新彼得大帝。

斯大林把他与布哈林的分歧概括为两条路线的斗争，指出：“我们实际上没有一条共同的路线。有一条是党的路线，是革命的、列宁的路线，……这第二条路线是机会主义的路线。”斯大林强调：“拒绝和右倾作斗争就是背叛工人阶级，背叛革命。”于是，1929年，联共（布）中